

论汉语典籍英译的翻译策略与文化传真

王海艳¹ 许伟丽²

(1、2 辽宁工业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1)

摘要: 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汉语典籍中俯拾皆是的文化元素决定了其英译过程中实现文化传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实现文化质和量的传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采用注释法、直译或直译加注、音译或音译加注、语境增益或文化替代等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 典籍英译;文化传真;翻译策略;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898(2014)05—0015—03

汉语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逐年提高,汉语典籍英译也随之盛行起来。然而,囿于典籍文本类型的特殊性,加之其蕴含的汉语文化元素众多,在英译的过程中,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既能让译文为译语读者理解并接受,同时又能将汉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过去或尽可能减少文化流失,即实现文化传真,汉语典籍英译者一直为此苦心孤诣。

一、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翻译不仅在两种语言中进行,更离不开两种语言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地域、宗教、历史习俗及民族心理意识等文化因素。因此,翻译从表面上看是两种语言之间在进行转换,但究其实质却是两种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是两种不同文化交流和对话的途径和手段。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1〕}所谓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语从文化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其目的在于将原语的文化内涵最大限度地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译语读者,使其在充分了解原语文化的基础上,能够产生和原语读者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感受,从而在输出原文文化的同时丰富译语文化。

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此目的并非易事。语言一旦进入语际交际的过程,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就成了制约因素。若想打破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桎梏,译者在擅长双语言转换的同时,还必须是双文化甚至是多文化者,即译者必须是文化人。只有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传真。

二、典籍英译过程中实现文化传真的必要性

在中国文化的众多载体中,典籍可谓是文化蕴

涵最丰富的一个。因此,典籍英译也成了中国文化精粹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虽然典籍英译的历史并不短暂,但纵观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史,却发现这也是一部不平衡的发展史。中国典籍英译最初的译者西方人居多,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多以西方的价值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来阐释中国文化。因此,许多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交流中出现了偏差,甚至出现了“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现象,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读。

例如,中国文化十分注重“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这一思想精髓在中国典籍中俯拾皆是。然而,许多西方译者在翻译此文化内涵时却将其附带上了西方宗教的色彩。以中国人对“神”的惯用称呼“天”的译法为例。有些西方译者如霍克斯《红楼梦》译者)将其译为极具西方基督教色彩的“God”,这就让西方读者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典籍英译的目的是要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传播给译语读者,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有一个全面的、全新的认识,在张扬中国文化个性的同时,也为其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舞台上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循文化传真原则,尽量减少文化的流失或误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三、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翻译与文化息息相关,应以传递文化的本质为原则和目的,但是当中西文化之间出现空缺或不对等时,译者通常会考虑通过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关涉文化的问题。所谓归化,就是以译语的文化价值为取向,而异化则以原语的文化价值为取

收稿日期: 2014-09-05

作者简介: 王海艳(1971-),女,满族,辽宁北镇人,辽宁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向。而译者在二者之中做出选择时则主要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典籍英译的目的是向世界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即以文化传真为基本原则。因此,在典籍英译过程中,为做到文化传真,译者必须选择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其原因如下:

(一)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必然的。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形成了独有的文化特色。“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流的前提则是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让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异域文化特色,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感受。”⁽²⁾

(二) 由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的。鲁迅先生谈到翻译的时候曾说过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译语读者阅读译文是为了了解异域文化,进而了解拥有该文化的人,甚至整个国家。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的不断增加,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储备,他们还需要进一步体验对他们来说具有陌生感的中国文化部分。因此,他们并不希望译文中有太多的归化的文化意象。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则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文化色彩,使译文独具异国风味特色,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

(三) 是维护中国文化长久独立的需要。在漫长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曾一味“引进”西方的文学、技术等,中国文化的“输出”则寥寥无几,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待到中国的文化有了“输出”之后,大部分译者为了便于西方读者阅读,或为了进行文化侵略,通常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抹杀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其特色。若要让中国文化长久独立,特色永存,典籍英译过程中采用保持异国情调、尊重差异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当然,典籍翻译要做到文化传真,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即非归化即异化,因为翻译时也应该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和读者接受性问题。一味地归化不可取,同样,一味地异化也不可取。翻译包括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在涉及文化方面,译者应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进行文化传真,而在涉及与文化无关的语言方面,译者应采用归化策略,用符合译语习惯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孙致礼曾就归化和异化给出他的见解,“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³⁾。

有鉴于此,典籍英译应以异化为主,兼顾归化,这样才能更好遵循文化传真的原则。

四、典籍英译中实现文化传真的翻译方法

人人皆道翻译难,原因之一是翻译从来不能避开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同样也不能避开对文化的解读和表达。因此,文化传真是翻译研究的关键问题。

在典籍翻译中,“文化传真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质的传真,它是文化保真的基础,就是对原作中文化性质的准确把握和传递,不能画鸡成鹅、画虎成猫,也不能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把动态的变成静态的;另一方面是量的传真,它是文化保真的进一步体现,它要求在把握质的基础上力求完整地传达文化信息,而不损害原作整体文化氛围的和谐性和个性风格。在文化翻译过程中,应该力求达到质和量两方面的保真”⁽⁴⁾。在异域文化的前提下,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的基础上,采用以下翻译方法来英译典籍以尽可能做到文化质和量的传真。

(一) 注释法。汉语典籍中所含文化意象众多,有些意象因时代久远或出现频率过低连中国读者也不甚了解,更遑论译语读者了。因此,为尽量做到文化质和量的传真,在典籍英译中,注释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此译法将译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在传递原文本文化特色的同时,消除了因文化隔阂给译文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

如理雅各在英译《中国经典》时,所做的注释是“译文”的十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正是这种“厚译”的注释法,为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翻译中的文学性和文化性本身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而翻译的异质性将以自己的方式显现出来,并不绝对依赖翻译的充分性与否。只要不做过渡阐释,注释仍然是协调原文本土文化和译者翻译计划的一个有效方法”⁽⁵⁾。

(二) 直译或直译加注。直译典籍中的文化元素,营造一种陌生感,可以激发译语读者通过学习相关背景知识来体味到不折不扣的原语文化,同时也是丰富译语及其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如《诗经》中,有大量跟当时劳动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河流山脉等名词,如桃树、硕鼠等。这些名词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英译过程中应尽量直译,以保证文化传真中量的传真。当然,译文也因此会更具异国情调。

鉴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译语读者未必能理解或者注意到原文中的每一个文化意象。译者此时可以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这样就可以将此意象的字面意义及引申意义同时传递给译语读者。适度的注释会充实、丰富读者的已有知识经验,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而使其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译文本。

(三) 音译或音译加注。在汉语典籍中,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人名、地名或专有名词并不鲜见,为传真其文化特色,又不能加以意译,这时便可采用音译或

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道德经》中频繁出现的阴、阳、道等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以“道”的翻译为例:有人将其译为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God”,如 G. G. Alexander,也有人用简单的“Way”一词译之,如 D. G. Lau,但这两种译法都不能体现“道”的思想精髓,也不能反映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因此,只有音译“Dao”或“Tao”才是最理想的。

如果单纯的音译不能传递文化意象的内涵,译者可以用文外加注的方法作为补充。音译加注既能保留原语的特色,又能让译语读者获得和原语读者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感受。

(四) 语境增益。典籍英译中,文内加注或称语境增益是既能做到文化传真,又能增加译文可接受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在翻译《楚辞·离骚》中的“索薺茅以筮蓍兮,命灵氛为余占之。”(Taking up holy inula and bamboo splints, I ask Ling Fung the sibyl to divine for me.)时,孙大雨就采用了此种译法。“灵氛”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是指“古代善占吉凶者”。孙大雨在采用音译的方法将其译为 Ling Fung 后,又进行了语境增益,补充了意为“古希腊、罗马的女预言家”的“the sibyl”一词。这样,译语读者对中西方文化中该文化意象的异同就一目了然了。

(五) 文化替代。中西文化固然存在差异,但也有共性,有些中国文化意象词在英语中也有对应的表达。译者只要熟悉两种文化,对此类词语特别敏感,就能够在译入语中找到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色彩的词语来替代。如屈原的《楚辞“离骚”》中有一

句“吾将上下而求索”,许渊冲先生将其译为: I'll seek my Beauty high and low. 原语中用方位词“上下”形容仕途坎坷,但侧面也衬托出诗人愈挫越勇的进取精神。而译语中表示“高低”的方位词“high and low”也有同样的文化色彩。因此,译者采用文化替代的翻译方法并很好的保留了原语的文化意象。

汉语典籍中蕴含文化元素众多。在其英译过程中,要做到文化传真实属不易,但这却是中国文化独立性得以保持和进行平等的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译者在英译汉语典籍时,不仅要考虑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意文化之间的差异,要以异化为主要翻译策略,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尽量保证原语文化质和量的传真。

参考文献

- (1)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 (J). 中国翻译, 2002(1): 39.
- (2) 严晓江. 文化翻译观下的《楚辞》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为例 (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1): 67.
- (3) 孙致礼. 文化与翻译.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4) 金敏, 尹富林. 从《红楼梦》的翻译探究文化传真的两种策略 (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2): 79.
- (5) 陈吉荣. 论人类学视域下的典籍翻译策略研究 (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4): 74.

(上接第6页) 展环境是外因。县域经济发展能为农村企业开拓者素质养成提升提供创业培训、提升农村企业开拓者的素质、激发企业开拓者的开拓精神。

综上所述,农村企业开拓者参与市场资源配置,整合县域资源,组织生产,发展县域经济,同时县域经济发展也为农村企业开拓者素质养成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农村企业开拓者成长。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协调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阶段,统一于现阶段科学发展的实践当中。农村企业开拓者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断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梁惠清. 农村企业开拓者成长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届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 2012.5.
- (2) 谈讲堂. 浅谈县域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论坛.
- (3) 闫天池, 刘晓宇. 实施小城镇战略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天津经济 2012(2).
- (4) 刘国斌, 陈治国. 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变革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东北亚论坛 2007(2).
- (5) 陈明华, 李旗, 于乐. 我国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域对策探析. 山东纺织经济 2007(6).
- (6) 许桂红. 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研究. 农业经济 2004(4).
- (7) 李强, 胡仪元. 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学术论坛 2012(9).